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

目 录

怀念邵伯平烈士	胡德兰 (1)
记傅烈同志二、三事	饶来杰遗作 (8)
回顾投身革命洪流青春时期	石凌鹤 (13)
我与父亲姜济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	姜治芳 (21)
回忆我在印尼的教育生涯	蔡奠华 (30)
回忆国民党江西省议会	王枕心遗作 (49)
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	何碧辉 赵寿龙 (59)
怀念抗日殉国的姚名达教授	郑亢行 卢贤中 (75)
	姚果原 罗发瑞
王枕心的生平简介	张红华 (88)
虚云和尚传略	张红华 (91)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形形色色	吴识沧 (97)
回忆在蒋经国先生身边的日子	毛宁邵 (115)
我所知道的赣州虎岗夏令营	刘子暎 (125)
我在虎岗夏令营	许泽月 (132)
旧中国江西五花八门的武术组织	张允建 (135)
记奉新盗银案始末	曾新民 (147)
在黄埔军校的江西人	文耀奎 徐良凤 (153)
封面设计	龚 声

怀念邵伯平烈士

胡德兰

邵伯平烈士为革命献身四十多年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我想到他，心里就感到沉痛，总想到他遇害的地方去凭吊一下。去年秋天，我才第一次到德兴县梧凤洞伯平的墓碑前，算是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一

邵伯平烈士是邵式平同志最小的胞弟，生于1908年，当时由于家境贫困，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伯平的母亲乳汁不足，就拿米汤喂养伯平，整天啼呀啼哭。不久，伯平的大嫂生了一个女孩，这样伯平就靠大嫂的一半乳汁维持了生命。

伯平小时候的命运很辛酸。当时家里生活异常困难，哥哥们要到田里去劳动，需要吃饱一点，所以留在家里的妇幼只能和着野菜填饱肚子，经常把棕树籽夹在饭里代粮。伯平的父亲是个硬汉子，从不肯向地主老财借贷。他想，我有这几个儿子，眼下都已成了壮丁，饿是饿不死的，再苦也要咬牙挺过去。

伯平五、六岁时就替人放牛。但他酷爱读书，每天把牛放妥，自己就偷偷地到私塾屋边，听先生讲课。有时还找来几张纸学习写字，不久他就能替人家抄写“花名册”。母亲见他天资聪颖，一点也不差于哥哥式平，常常对伯平说：“孩子，你命不好，不该出生在这穷人家，生在有钱的人家就好了。”母亲心疼这个最小的孩子，想尽办法，全家省吃俭用，终于把伯平送到了弋阳县高等小学上学。伯平进校后，就以战斗似的、烈火般的、勇猛向前的精神开始学习。他在学校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革命思想，从此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假期他回到家乡，常与附近的进步青年汪梅亮、汪明、邵伟、邵棠等在一起，他们加入了邵式平创办的革命团体“益友社”。伯平经常向穷苦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穷人终年劳动，累得死去活来，还不得一饱；而财主坐在家里享福，每天是大鱼大肉。他们是吃我们穷人的肉，喝穷人的血，我们决不许他们压迫、剥削穷人。他们不劳动就叫他没饭吃。群众听了这些道理，都说我们能革他们的命就好了。

二

一九二六年，国共合作。赣东北的农民运动开始兴起。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到处建立。农民真的当家做主了。就在这革命的洪流中，邵伯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邵式平在弋阳九区举行武装暴动。为了扩大革命势力，让革命烈火燃遍赣东北，方志敏派遣邵伯平到弋阳七区沙湾周家村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伯平任弋阳七区区委书记。他整天走村串户，用深入浅出的话语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伯平召集贫苦农民组织了贫农团，展开抗租、抗粮、抗捐、抗税的斗争。当地群众都把伯平看成是自己的主心骨，爱戴他、拥护他、保护他。有一次，伯平受到反动派的追捕，情况非常危急。在稻田里割稻子的群众见此情状，急急唤住伯平，要他仰卧稻田深处，由他们去支开敌人。在群众的巧妙周旋下，愚蠢的敌人跑开了。伯平从田里站了起来，紧紧握住这几位农民的手，叫道：“好兄弟、好同志。”几位农民却说：“你整天在外面奔波，连性命都不要了，家里也牺牲了十几口人，这都是为我们将来过好日子。我们应该保护你。”

一九二九年，伯平任弋阳县委副书记兼七区区委书记，他虽然调到县里工作了，还是经常到七区去，大事小事区里都和他商量。一九三〇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赣东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情况非常紧张，尤其是七区张家村，敌人经常来杀人、放火。方志敏

同志亲自命令邵伯平到张家村一带组织群众，对敌斗争。有一天，伯平从县委回到区委机关，看见同志们一个个心事重重，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摩拳擦掌。原来，敌人几天之内要到张家村来实行“三光”政策。并且扬言要活捉邵伯平。伯平听后冷冷一笑，他说：“要鼓起劲来，我们永远不向敌人低头，不做敌人的俘虏。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要勇敢，不怕牺牲。”听了这番话后，同志们的情绪都为之一振。大家分头组织群众，准备对付白狗子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蒋匪军一个团向张家村扑来。大雪纷飞的早晨，瞭望哨的同志发出了信号炮。除了武装瞭望的同志和几个主要负责人之外，张家村和附近几个村的群众一律撤退到山上的岩洞里。张家村的山上有好几个岩洞，石炭坞岩是其中最大而且最险要的一个。那岩洞里有两道关口。清朝咸丰八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到张家村时，村里的地主老财都躲藏在石炭坞岩里，太平军在洞口堆柴放火，用四架风车向洞里灌烟，可烟进不了二关。洞里的地主老财一个也没有熏死。当地群众认为这个岩洞是天赋予人的堡垒。白狗子包围了洞口，向里面喊话，快出来投降，否则把你们全部熏死在里面。洞里的群众谁也没有理他。匪军见喊话无效，即下毒手。他们用木柴将洞口堵得严严实实，撒上毒药，放起了大火。就这样，三百多不屈不挠的革命群众，被敌人活活毒死在洞里。敌人走后，伯平率领救援的同志赶到洞里，只见三百多具尸首一个个全身浮肿，皮肤变黑，口上都有一球白沫。伯平见此惨状，当即昏倒在地。第二天，伯平在山下召集群众大会，安定群众情绪，指出今后斗争的方向，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这就是赣东北革命史上记载的三百名宁死不屈的烈士壮烈牺牲的事迹。一九五一年，由谢觉哉同志率领的中央老根据地访问团曾凭吊过此地。

一九三一年初，伯平调到县赤色警卫团任政委。三、四月间又调往赣东北省红军医院任政治委员。在医院工作期间，他把全部心血投入到医院的建设中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医疗器材和医药的来源奇缺，充满乐观精神的邵伯平从来不会向困难低头。他

一方面向医务人员和伤病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组织人力到山里采集草药，用土方、民间秘方给病号治病。为了让伤病员有一个很好的休养环境，伯平组织了一个俱乐部，有象棋、演唱和文明戏等演出活动。他还十分重视培养医务人材，发展扩大医务人员队伍，医院里特地开办了一所附属医务学校，招收学员两百多人。伯平亲自给学员们上政治课。他满怀激情地向学员们说：“别看我们现在茅屋几间，缺医少药，只要我们团结奋斗，我们的事业是会发展的。十年、二十年以后，谁能肯定我们不会出几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呢？你们要认真学习，掌握本领。”不久，红军医院从弋阳黄家源迁到宣湖村，改名为赣东北省红军总医院。下辖四个分院，分别设在横峰大源圩、青板桥和德兴文港、小梅圩等地。附属医务学校的创建，为四个分院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务人员。伤病员的收容量也随之增加，仅总院就收容1500人，成为一所有内外科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初具规模的正规医院。同时，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医生担任了医院的各级领导。其中有院长邹思孟，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何敢夫，副院长兼内科主任周炎林，还有邹怀民医师等，他们分别毕业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厦门医大和广州中山大学。在他们的精心指导下，红军总医院的医疗技术迅速提高，可以做截肢手术，难产的孕妇可做剖腹手术。在当时严峻的战争年代，伯平就注意到开办医务学校，培养医务人员，这是他的卓识远见。他对医务工作的贡献，将永远记在赣东北人民心中。

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医院九百多名伤病员分几路转移到深山密林里隐蔽。伯平经常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看看有没有伤员掉队，当他发现有四名伤员躺在路边的草丛里没人抬，伯平急忙走上前去，这四人都是重伤员，见伯平走向自己身边，都急忙挥手致意说：“政委，不要管我们了，你赶快转移吧。”伯平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想，担架缺，民工少，但我们决不能抛下一个阶级弟兄。伯平赶忙跑到附近的村子，借来了几张

竹床，亲自与医院的学员刘济民等人将伤员抬起就走。爬山越岭没有平地走得快，后面追赶的枪声渐渐逼近了。体弱力小的学员吴云清脚下一滑，将伤员王万生摔在地上，伤口渗出了鲜血。王万生强打笑容对伯平说：“政委，太难为你们了，把我放在路边草丛里，你们快走吧。”伯平喝住他的话，“你不要这样说，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正在紧急关头，院长邹思孟带人接应来了。可是山路难走，始终甩不掉敌人的追赶。伯平急中生智，提出前拉后推的办法。即两个人抬担架，外加两人在前拉，两人在后推。这样一来，速度果然加快了很多。六个人抬着伤员，一口气翻过了大山，进入密林，直到天黑了才听不见敌人的枪声。伯平就是这样，以饱满的阶级情感，关心爱护伤病员。就是在伯平周围工作的同志，也时常得到伯平的关怀。那是一九三一年冬天，军部被服厂在困难的条件下给医院提供了一些冬衣。伯平是政委，管总务的同志就给他发了一件棉衣。伯平凭着自己年轻体壮，把发的棉衣让给了别人，自己只穿一件羊毛背心御寒。后来他看到医院工作人员张德华衣服单薄，又脱下这件羊毛背心给张德华穿。小张见伯平只穿单衣，心里很不过意，坚决不肯收。伯平笑着对小张说：“怎么，你嫌我太瘦了。告诉你，我比你胖得多，这件背心你穿得一定象大衣。”小张一时没有领会伯平的意图，不服气地说：“没那个事。”边说边把背心穿上了身。伯平笑着一溜烟地跑开了。事后尽管张德华多次要送还给他，可伯平总不肯收回。

在战友们的印象里，伯平是个性情活泼开朗，工作认真负责的年轻干部。他平易近人，无论男女老少，见面都象家人一样，有说有笑，有时讲讲小故事。大家看见他有声有色的样子，都说他高兴得“发癫”了。因此很多人亲热的称伯平为“癫子”。邵式平同志一向对伯平要求很严，从不因为是自己的弟弟而另眼相看。伯平有过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可惜结婚才半年，妻子不幸染病去世。伯平在极度悲伤中，想把妻子的遗体送回娘家去安葬。他没有向省军区请假，只给医院的院长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这

件事在今天来说，是极平常的。但在当时战争年代却不允许发生。当时担任军区司令员的邵式平，得知伯平没有向军区领导请假，离开职守，非常气愤。他把伯平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式平说：

“我们共产党员主要是起先锋模范作用，为人表率。你不向军区请假就擅自离开岗位，如果敌人来了，你的医院怎么应付突然的情况变化呢？你的纪律性不强，要给处分。”为了教育伯平和其他同志，邵式平提议给伯平以党内警告处分，消息传出后，医院全体工作人员都为之震动。这件事给伯平很深刻的教育，在以后的工作、战斗中，伯平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终于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三四年八月，伯平调(开)化婺(源)德(兴)中心县，任中共开化特区区委书记。开化特区受闽浙赣省委和化婺德中心县委双重领导。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境，特区区委最后只剩下邵伯平、苏水德、曹金香三个同志在坚持斗争。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敌人更加疯狂，采取村村筑碉堡，小村并大村的野蛮手段，实行保甲连坐：

“一户通共，十户同罪。”面临这样更加危困的环境，他们在寒风刺骨、冰天雪地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仍然意志坚定，毫不动摇。曹金香同志病倒了，就寄居在群众家里。他们在特区坚持战斗到这年的冬天，又因开化突围北上失败，折回德兴县龙头山革命根据地。本来他们准备发动根据地群众，重整队伍，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但因当时强敌重重包围，敌军日夜进村骚扰，苏区干部和基本群众被迫纷纷上山搭棚避难。伯平等几位从开化突围折回的战友，只得暂时分散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基本群众避难的茅棚里，这时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彼此已经失去了联系。据伯平当年的警卫员严加福同志告诉我，伯平这时化名洪志英，隐蔽在龙头山的洪家坞、乡苏文书祝能静的避难棚里。因白军将乡苏主席蒙贤标关押在暖水敌团部，叛徒祝木牙、陈荣副以释放蒙贤标为钓饵，诱骗蒙的儿子蒙起良出卖了邵伯平同志。于是由蒙起良引路，将两个叛徒带上山。久病体弱的伯平同志正发高烧，三个暴徒突然抱住他，伯平不幸惨遭杀害。

三

邵伯平烈士二十七岁就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牺牲使式平和我失去了同患难的战友，亲爱的兄弟，党失去了高尚有为的儿子。他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党性，坚定的革命立场。他虚心好学，生活艰苦朴素。他一生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没有过一天舒适的生活。他总是乐以忘忧，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和式平同志无论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在硝烟弥漫的东北战场；无论是在南下的行军途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每当回忆往事，我们心里总是十分悲痛，十分伤感。我们总是更加努力工作。一九六〇年，邵式平同志填《菩萨蛮》词一首，寄托了我们对邵伯平烈士的哀思。

伯平党性坚似铁，
那怕牺牲和流血。
即是登险峰，
步伐常从容。
梦游梧风洞，
土石化劲松。
凭虚听松涛，
心潮逐浪高。

同年，德兴县人民委员会在龙头山梧风洞为邵伯平烈士立了墓碑，《菩萨蛮》词就刻在墓碑上。

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祖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阔步前进，先烈的未竟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我们缅怀先烈，这会使先烈的英灵增加无限的安慰，九泉之下当会翩然起舞。

记傅烈同志二、三事

饶来杰 遗作

(一) 1920—1924年在法国勤工俭学

傅烈同志原名傅见贤，在江西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任教于高志模范小学。以后曾在上海求新造船厂当学徒，学习手艺，得知华法教育会在上海设有勤工俭学会，提倡并介绍各地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他未经家庭同意即去该会报名志愿前往。至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和同乡邓荣德、涂名扬（均为江西省宜黄县人）一起，由该会介绍，乘法国邮轮阿尔芒勃西号离开上海，到法国勤工俭学。六月十五日到达法国马赛港，旋即去巴黎，由华法教育会分配在蒙达尔公学补习法语。

一九二一年初，巴黎勤工俭学会介绍第一批十人去哈佛勒地区圣乃德铁工厂当学徒工。这十人中有江西籍的傅烈、涂名扬、江学轩、饶国璋和我五人，河北籍夏述虞、李书田、焦玉峰等五人。我们一同由巴黎乘火车至哈佛港前往该厂报到，并同住在该厂一间可容二十人住宿的简陋的木架棚舍中，分组在宿舍内自办伙食。由于南北口味不同，我们五个江西人组成一个伙食小组。嗣后第二批来厂当学徒工的彭树敏也加入了这个小组。我们六个江西人同工同住同食，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一样感到格外亲切，公推傅烈作为宿舍中这一组的代表人。他在哈佛勒工读期间，工作积极，学习勤奋，待人接物态度诚恳，又乐于帮助他人，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圣乃德厂工人曾举行一次大罢工。在傅烈、李林、黄品铭等同学的推动下，我们在该厂学习学徒工的十五个同学虽受有合同的约束，也随同法国工人一起参加了这次大罢工，以表达中国工人对这次罢工的同情和支持。这一行动曾受到当地

工会和罢工工人的赞扬。这次罢工胜利结束复工后，厂方对我们不满，把我们十五个人分散在该厂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劳动，以此作为报复。但是我们从内心里倒也感到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傅烈在这次中国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说明他当时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已在我们同学中起了先锋作用。

一九二一年各地留法勤工俭学生连续发生三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一）各地勤工俭学生数百人于二月二十八日齐集巴黎，赴中国驻法使馆请愿，要求生存和求学权利；（二）巴黎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旅法各界华人于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厅开大会反对中法大借款；（三）各地留法勤工俭学生于九月二十一日派代表百余人前往里昂中法大学，争回里大求学权利。在这三次群众运动中，在哈佛勒作工的同学由于工作关系虽未派代表前往参加，但对于领导这几次运动有关组织和同学则分别由傅烈、李林等通函响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同时在当地广为宣传，对这些斗争起着良好的影响。显示了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团结和力量。

在这期间，巴黎方面的江西同学曾发起向江西省政府请求拨款接济本省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行动，我们便推举傅烈为代表并负责起草申请书，他当即欣然接受，果然他不负众望，很快地就完成了这一起草工作。后由巴黎华法教育会将这项申请书转致江西省政府。江西省政府终于拨给本省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次救济款项。这次款项拨寄之后，巴黎有个江西同学汪恩广因回国川资不足，曾函商我们在哈佛勒作工的江西同学协助凑借，经傅烈和我们商量后，便由我们在该厂作徒工的六人共同凑足，终于使汪恩广得以成行。这就表现了傅烈热心为集体服务而又乐于助人的高尚风格，成为江西留法同学公认的代表。

通过上述各次群众活动，傅烈和外界有关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接触新思潮的机会较多，他的政治思想也就随之日益提高。这是我和他朝夕相处，从他的言行中深深感到他已走

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傅烈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傅烈和我两人已分得江西省政府拨发本省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次救济费，便辞工离开哈佛勒来到巴黎，经勤工俭学会介绍，于十月初进入法国夏立德地区职业学校学习。由于该校没有空余的学生宿舍，我们便在该校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又过着同食同住同学习的生活。当时在该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共有八人，其中傅烈、方至刚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首先以我为对象，介绍我入团后，便开始成立夏立德团支部，直属巴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由傅烈、方至刚先后任支部书记。至一九二三年六月，夏立德团支部已陆续发展，在该校学习的八个中国学生都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傅烈传播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发展团组织所取得的突出成果。他也是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带路人。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傅烈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三年七月，学校开始放暑假，我们二人便离开夏立德去巴黎找工作。由于我们持有哈佛勒圣乃德工厂所发的“工具钳工”证，很快地就考取巴黎西郊百庄地区“洛兰”飞机汽车发动机制造厂的装配工人，并同住在工厂附近一家供食宿的旅馆中。中共旅欧总支部随即通知傅烈联系在百庄及哥仑布地区作工的毛光生、毛开选等同志和我成立“百庄—哥仑布”地区团支部，由傅烈担任支部书记。以后，傅烈经常去总支部联系和协助工作，参加总支部所指示的各项革命活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使本支部为总支部和其他支部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取得对内教育、对外宣传一致的步骤，使得总支部在统一革命战线，对敌进行斗争时，收到显著的效果。

（二）1924—1925年在苏联学习

一九二四年九月间，中共旅欧总支部派傅烈、彭树敏和我等十余人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法国巴黎经德国柏林、汉堡、

渡波罗的海，至苏联列宁格勒，于十月间到达该校随班上课，并参加中共旅莫支部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的教育。当时在该校学习的中国学生都是由中共旅莫支部统一领导进行，过着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的集体生活，使每个人都感到在此学习有信心把自己锻炼成为钢铁般的革命战士。傅烈在学习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他善于遵循领导的意志和同学在小组中或与个人谈话中互相讨论学习，使每人对上级领导意图有明确的了解，而又能将同学对每一问题学习的心得和见解进行概括，不时地向党支部领导反映，密切支部与党员群众的联系，成为既是领导的助手，又是同学的代言人，他确是一个尊重领导，虚心向群众学习，作出了好榜样的同志。

当时中共旅莫支部为了适应国内各条革命战线的需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才能，先后选派一些同学在苏联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特种教育和训练。傅烈同志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被派在公安部门学习，学习苏联公安建设工作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不久，即被指调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三）1925—1927年在中共广东区委工作

傅烈同志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由苏联回国后，由中共中央分配来中共广东区委，在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具体是在广州公安部门开始建立情报工作，为党收集各方面情报，以供上级及时了解当时军政各方面的动态。由于他要经常和有关情报人员接触，很少来区委机关，或在公开场所露面。为了使他便于工作，经党组织同意，要他把他爱人从江西临川老家接来广州同居，其住所则不让一般熟识的人知道。当他的爱人来广州不久，他便领我去他们住所和她见面。他的爱人陈彩蓉是一个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胸襟开阔而诚实的妇女，对她当时的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帮手。

傅烈同志在广州这一时期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深入，对当时国民革命的进展是有很大贡献的，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节节胜利，党派他去四川重庆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他的爱人陈彩蓉也随同前往，当时四川省党组织仍处在地下工作时期。他们离开广州时，我和熊雄仍在黄埔军校工作。

一九二九年，我在南京公共汽车公司工作期间，遇到涂名扬同学，他告诉我，从他的家乡得知，傅烈同志在四川工作期间被敌人谋害而牺牲，我深感震惊。回忆当年共同生活，傅烈是一个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党为人民，英勇沉着的革命青年，不料竟遭敌手，殊令人悲愤无已。他遇难时还不满三十岁，正是当时革命事业中一位有力的干材。他的牺牲是党的一个损失。

~~~~~  
(上接20页)

徐跃下狱多年却未遭极刑，便是其父徐馨山先生罄其有用为独生子买命的结果。此外，徐韶善同志逃亡在外，他父亲因交不出乃子，却被勒索不遂的“差使狗”害死在途中。其余同志皆已逃亡得不知去向。就这样死的死，逃的逃，在狱的也只能凶多吉少。支部活动不复存在，而暴动计划更成泡影了。

事已如此，我该怎么办呢，革命组织涣散，我个人的力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和父母兄弟商量，只好同意近支哥哥石联星、石联鸾的劝告，一同去日本留学，别无出路了。

我亲至山下朱家村，向远房亲戚告贷出国盘缠。承借给银元六十，再在家里搜求变卖金银首饰，凑得二十元。就在中秋晚上，眼见皓月当空，我自悄然离去。二弟送我上路，我对他说：“不管环境如何恶劣，真理必须坚持。我们兄弟四人，四弟还小，管不了家务；你如果今后也要远离家门，一定要三弟留在家里，管管田里的事。至于村里的革命组织，就落在你们两人肩上了。”依依惜别，倍觉情长。好在二弟保证，除远出读书以外，一定留人照顾家庭，要我放心。直到城西港口村河沿，我平安地和等在船上的联星、联鸾哥见面，二弟才独自踏月回家，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 回顾投身革命洪流青春时期

石 凌 鹤

一九二六年的夏秋之交，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节节胜利地打到我家乡——江西乐平。这震撼山岳的狂飚，使每一个血性青年十分兴奋而跃起。我投身于革命洪流，在一位连指导员的号召和领导下，参加了国民党乐平县党部的“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行列。先是受命组织布工人工会和店员工会，上街示威游行，显示了一九一九年学生运动的同等气派。继则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雄歌，率领工人学生，打到美国人开办的耶稣堂去；尽管“洋鬼子”、“洋婆子”早已“逃之夭夭”，我们却将圣经和耶稣像等印刷品焚烧殆尽。而天主堂的几个中国人**恹恹**，吓得关门闭户地不见人影，我们却没有动她们。再则是那班作威作福的四大劣绅中，徐为善、石用敷和蔡家厚的父亲（已忘其名），都逃匿得不见踪影，只捉到一个王筱芳，戴高帽逛街之后又关进县监狱，群众拍手称快。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热闹一时。县政权由省政府派委知县掌权，我们只管党务。我记得县党部宣传部长是汪溶三，青年部有徐镜寰和徐韶善，妇女部有徐杰英、何忆嫔，汪挥岫等人，我担任工人部长，陶润水则是工会领袖。

从夏末到旧历年终，只就县城而言，确是一番新气象。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只是凭一时革命冲动，热烈气氛则有余，如何巩固阵地，完全不予设想。至于思想上如何提高觉悟，更是除背《总理遗嘱》和阅读一些《三民主义》有关小册子以外，可说是幼稚得可怜。我还记得，这一年除夕之前，悄悄地读了那位连指导员给我的《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觉得非常新鲜和感到兴奋，可

是却读不懂汪溶三送给我的《克鲁泡特金传》，也不知道所谓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优劣异同。于此可见我那时的政治水平何等低下了。

我这时已在中学同班同学季恨秋（昌）的通信中，得知他此时已是南昌市党部宣传部长，兼省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邀我去南昌工作，我也怀着到省城去总比在县里革命有出息的私心，过了阴历年不久，便离开乐平县党部去南昌。其时，妇女部的徐杰英和汪挥岫，也为了到省城读书而结伴同行。

我到省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不久，便有机会听到仰慕已久的郭沫若先生的演讲，亲睹丰姿，十分高兴。其时，他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浑身上下全副武装，英姿焕发地在台上作狮子吼，措词严谨，象是在朗诵早已背熟了的文章。我当时心头赞叹不已，到五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还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后，我在百花洲的墙上，第一次看到大幅水彩宣传画，颇为惊喜。该画是第三军政治部的画家作品。画上两个女人，前行者是雍容华贵的阔妇人，后随者为乡村养蚕少女。题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熟悉的两句唐诗，用在这里作为阶级对比，对于我颇得启发。

我在总工会结识不少思想很左的同志。有的很愿意显示自己马列主义观点。这中间包括在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学习的胡德徽同志在内，而我自己亦暗以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而进行世界革命自许。我将自己的愿望多次向季恨秋和盘托出。

这一年的春末开始，国民党左右两派的斗争激烈，阵线分明。而左派的中坚分子多为共产党员，例如我们总工会成员中来自萍乡煤矿的湖南醴陵人，他们在领导工作中表现的慷慨激昂，几乎不必掩盖自己CP面貌，我自然对他们表示亲近和尊敬。

从以下实例可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行动。

某日，负责同志要我当代表，到赣江西岸牛行车站去欢迎英国工人代表团。这对于我颇觉新鲜，因为过去从不曾和外国人直接打



过交道。果然，当这班碧眼黄毛的洋人走下火车时，我迎上去握住那一双双毛茸茸的肥大的手，委实觉得惊奇，而且手指酸痛。眼见他们挺胸阔步地在军警保护下登舟渡江，又一次看见“洋鬼子”何等威风，不由得立刻产生半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鄙睨和憎恨。所以当晚听误传这些人是英国黄色工会代表，是右派邀请来华进行欺骗宣传的“工贼”，我和工人纠察队队长涂凌云一样，愤怒异常。于是当夜拿到发给我的一支手枪，要我准备明天破坏“欺骗宣传”会场，使我彻夜不能宁静；何况第一次手握杀人武器，很想打响一枪试试，但到底不敢轻举妄动。

翌日上午，我按时到达东湖东岸的体育场（现南昌江西宾馆后面的原游泳池旧址）会场，为时不久，便见洋人分别坐着两人抬的凉轿，在警察簇拥下来到挤满群众的会场。而右派头目之一（我说不上他的姓名）即在台上卑躬屈膝地迎迓。我气愤地等候以鸣枪为号的命令。可是正当我心情紧张的时候，原来发枪给我的领导人，突然找到我低声说“停止行动”，并收回我捏在长衫衣袋里的手枪，这使我兴味索然，精神涣散，感到莫名其妙。就在这迷惘的短暂时间之后，突然有人朝天放了一枪，顿时群众譁然，秩序大乱。一方面“洋人代表”仓皇坐轿离开会场，同时另一方面是小孩子哭、妇人喊，乱推乱挤地争相逃命。刹时间，东面的一堵砖墙被挤塌了，小孩儿跌倒在地下，有的人踩在人身上奔出去。我高喊着“不要挤……不要踩倒人”，极力维持秩序，直到人们尽散为止。

当我回到总工会的时候，也弄不清楚这次行动变化的实情，因为当时中共江西省委的决定，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直到一九八一年底，徐先兆同志查考有关历史资料，才知那一批英国工人代表并非黄色工会，而是曾经受到我党中央负责同志欢迎接待的国际工人代表团。只是当年的总工会不及时了解情况，以致引起不小的误会。

不过当时以国民党省党部为代表的右派，和左派自居的省总工会之间的斗争，确实日趋白热化；我们的工人纠察队，日夜手持木棍